

# 神经质人格与高职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关系： 特质应对的中介作用

李思馨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1月11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28日

## 摘要

目的：探讨神经质人格对高职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及特质应对方式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方法：采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极简版(CBF-PI-15)、高职生心理健康发展回溯问卷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831名高职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神经质人格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 $\beta = -0.17, p < 0.001$ )，显著负向预测积极应对方式( $\beta = -0.25, p < 0.001$ )，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 $\beta = 0.55, p < 0.001$ )；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健康( $\beta = 0.28, p < 0.001$ )；消极应对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 $\beta = -0.36, p < 0.001$ )。2) 特质应对方式在神经质和高职生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结论：神经质人格能通过特质应对方式影响高职生的心理健康。

## 关键词

心理健康，神经质，特质应对方式，高职生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roticism Personality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Trait Coping Style

Sixin Li

College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Received: Nov. 23<sup>rd</sup>, 2022; accepted: Jan. 11<sup>th</sup>, 2023; published: Jan. 28<sup>th</sup>, 2023

##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neuroticism personal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ole trait coping style plays in the influence of neuroticism personal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831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China Big Five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CBF-PI-15), the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Retrospective Questionnaire and the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 Results: 1) Neurotic personality negatively anticipates mental health in a significant way ( $\beta = -0.17, p < 0.001$ ), negatively anticipates positive coping style in a significant way ( $\beta = -0.25, p < 0.001$ ), positively anticipates negative coping style in a significant way ( $\beta = 0.55, p < 0.001$ ); positive coping styles positively anticipates mental health in a significant way ( $\beta = 0.28, p < 0.001$ ); negative coping styles negatively anticipates mental health in a significant way ( $\beta = -0.36, p < 0.001$ ). 2) Trait coping style is a mediator in the influence of neuroticism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Neuroticism can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mediator of trait coping style.**

## Keywords

Mental Health, Neuroticism, Trait Coping Styl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2022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这是职业教育法制定近26年来的首次修订,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在教育强国的背景下,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多样化技术技能人才,以往就业以传统产业建筑业、运输业为主,近几年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幼儿教育对技术技能人才缺口增大(人民政协网,2022)。因此,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必然趋势。

高等职业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20年高职生在大学毕业生中占据47.2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并且,2021年高职院校招生557万人,相当于十年前的1.8倍(人民政协网,2022)。高职院校学制短、学历低的特征(陈启山,温忠麟,2005),使得相较于本科大学生,高职大学生在社会文化和就业形势中认可度较低,已有研究表明,高职生自卑心理水平偏高(王浩,俞国良,2016),存在心理危机(邓忠等,2019)。高职生来源于升学失利无可奈何进入高职院校的高中生和职高生,并且职高生在中考升学过程中已经经历过一次失利。随着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被打破,毕业后继续攻读本科也成为越来越多高职毕业生的选择。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2012届高职毕业生升本比例仅为3.3%,而十年后2021届达到19.3%,增长超过4.8倍(人民政协网,2022)。但高职生有且仅有一次在应届毕业当年进行升学考试的机会,他们整体学习基础差,过往的学业挫折感也易使其缺乏自信心(曾伏云,2002),而学业压力是影响大学生心理至关重要的因素(车文博等,2003;徐长江,钟晨音,2002)。此外,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在青年期与成年期之间,是人生生理和心理发展变化的活跃期,也是心理压力的多发期(车文博等,2003),因此,高职生承受着面对就业、升学、家庭、同伴接纳等多重压力。过重的压力负担会导致人与环境交互的不平衡,长此以往不仅影响心理健康,严重的会出现行为障碍或是人格缺陷(陈启山,温忠麟,2005),还会增加患病风险,比起吸烟和胆固醇水平,心理负担与心脏病发作风险密切相关(Karasek,1988;Vaccarino et al.,2018)。因此,探索高职生心理健康发展对提升未来高职教育质量至关重要。

人格是指源于个人自身的稳定行为方式和内部过程(Burger, 2014)。Marshall et al. (1994)研究发现神经质人格与心理健康有关。具有神经质人格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并体验消极情绪(Gunthert et al., 1999)。大量研究表明,神经质是精神障碍患者的核心人格特征(Kotov et al., 2010; Malouff et al., 2005)。此外,神经质的人对生活事件更敏感,他们对生活事件的评价也更消极(Mirnic et al., 2013)。由于情绪调节不良,他们会将这些情绪从一个领域代入到另一个领域当中(Ozer & Benet-Martinez, 2006; Suls & Martin, 2005),这往往导致不健康的心理状况(Lamers et al., 2012)。因此,本研究假设神经质人格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

神经质会影响个体的特质应对方式。特质应对方式(traits coping style)是有个性倾向性的、相对稳定和习惯化了的应对方式(姜乾金, 祝一虹, 1999),当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作出的认知与行为的努力过程,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姜乾金等, 1993)。以往研究发现,神经质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 Penley & Tomaka, 2002; Watson & Hubbard, 1996),神经质水平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回避应对方式(David & Suls, 1999; Gunthert et al., 1999; O'Brien & DeLongis, 1996; Zainah et al., 2019)。相反的是,神经质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Gunthert et al., 1999; 马焯等, 2004)。

神经质人格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根据 Lazarus (1993)应激理论,应对方式是应激源、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中间变量(Folkman & Lazarus, 1988; 傅俏俏等, 2012; 姜乾金等, 1993),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起重要作用。应对方式对健康有直接影响。大量研究表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不利于心理健康(Fergus & Zimmerman, 2005; 姜乾金等, 1993; 姜乾金等, 1987; 廖友国, 2014)。积极的应对方式与自我效能感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呈显著的正相关(Andrews, 2004; Cosway et al., 2000)。同时,积极的应对方式会减少个体的痛苦体验,增加积极的结果,从而提升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Taylor & Stanton, 2007)。

综上,本研究以高职生为研究对象,探讨高职生神经质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特质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以期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证支持。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从福建选取5所高职院校1011名大学生进行集体问卷测量,教师在课堂施测时对学生强调无记名且问卷数据保密原则,同时表示学生在测验过程中可随时退出。剔除测谎题判断错误和规律作答答卷后,回收有效问卷831份(有效率82.20%)。其中,男生201人,女生630人;大一661人,大二167人,大三3人,平均年龄19.13岁( $SD = 1.01$ 岁);高中来自职高417人,来自普高414人;有班干部经历208人,无班干部经历623人;独生子女161人,非独生子女670人;城镇大学生为263人,乡村大学生为568人。

### 2.2. 研究工具

#### 2.2.1. 高职生心理健康发展回溯问卷

采用黄金玲、连榕2020年编制的高职生心理健康发展回溯问卷,问卷有17道题目(黄金玲, 2021),包含4个维度:学习动机(4个项目)、亲子关系(4个项目)、情绪状态(5个项目)、自我效能(4个项目)。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说明高职生心理健康发展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0.86。

#### 2.2.2.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

采用姜乾金1999年编制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问卷有20道题目,包括两个因子,即消极应对(NC)和积极应对(PC),每个因子10道题目(姜乾金, 祝一虹, 1999),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

说明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水平越高。该问卷用于反映个体具有的特质属性以及与身心健康有关的应对方式,估计个体对生活中各事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应对策略。该应对评估方法有助于对个体应激水平的了解,同时也适用于关于健康的各种研究项目。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NC 和 PC 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分别为 0.84 和 0.73。

### 2.2.3.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极简版(CBF-PI-15)

采用王孟成等人 2019 年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极简版,问卷有 15 道题(Zhang et al., 2019),采用李克特六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2 代表大部分不符合,3 代表有点不符合,4 代表有点符合,5 代表大部分符合,6 代表完全符合。包含 5 个维度:神经质维度,尽责性维度,宜人性维度,开放性维度,外向性维度,每个维度各 3 道题目,在本研究中,五个维度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分别为 0.83, 0.68, 0.69, 0.82, 0.72。

## 2.3.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统一施测当场收回,每班配备两名教师主试。在答题前,使用统一的指导语控制情景,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然后按指导语的要求完成整个问卷。在指导语中说明本次调查的意义,问卷填写均采用无记名方式,并强调对调查结果保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作答,完成问卷后均获得一份小礼物。

## 2.4.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相关性分析;使用 Mplus7.4 软件,采用 MLR 法进行参数估计(温忠麟,叶宝娟,2014),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特质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与心理健康发展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 3. 结果

###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SPSS20.0 进行 Harman 单因素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共析出 9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 22.73%,低于 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 3.2. 相关分析

通过双变量相关分析发现:高职生心理健康与消极应对方式、神经质人格特质呈显著负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人格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具体情况见表 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trait coping style and neurotic person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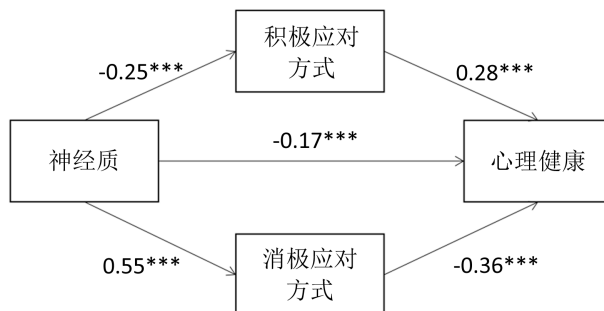
**表 1.** 心理健康、特质应对方式及神经质人格的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1 心理健康	65.00	9.45	-			
2 消极 NC	28.56	7.45	-0.47***	-		
3 积极 PC	32.91	5.73	0.35***	-0.08*	-	
4 神经质	9.98	3.39	-0.44***	-0.55***	0.25***	-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01$ , 下同。

### 3.3. 特质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使用 Mplus7.4 软件, 采用 MLR 法进行参数估计,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检验特质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 该中介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 = 2.26$ , RMSEA = 0.04, CFI = 0.99, TLI = 0.98, SRMR = 0.02, 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模型结果表明, 神经质人格能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 $\beta = -0.17, p < 0.001$ ), 显著负向预测积极应对方式( $\beta = -0.25, p < 0.001$ ), 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 $\beta = 0.55, p < 0.001$ ); 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健康( $\beta = 0.28, p < 0.001$ ); 消极应对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 $\beta = -0.36, p < 0.001$ )。



注: 图中所列数字为标准化解, \*\*\*表示  $p < 0.001$ 。

Figure 1. Structure model diagram of mediation effect

图 1. 中介效应结构模型图

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检验特质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与高职生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2)。

Table 2. Mediation effect value and Bootstrap test results

表 2. 中介效应值和 Bootstrap 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值	Bootstrap 置信区间(95%)
总效应	-0.44***	[-0.50, -0.37]
神经质→积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	-0.07***	[-0.10, -0.05]
神经质→消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	-0.20***	[-0.25, -0.15]
直接效应	-0.17***	[-0.25, -0.09]

研究表明, 积极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特质与高职生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效应值为-0.07,  $p < 0.001$ , 95% CI = [-0.10, -0.05], 中介效应占比为 15.91%; 消极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特质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效应值为-0.20,  $p < 0.001$ , 95% CI = [-0.25, -0.15], 中介效应占比为 45.45%。

为探讨神经质人格对大学生的不同的特征应对方式是否有不同的影响, 对神经质到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两条路径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这两条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Wald Chi-square = 280.82,  $df = 1, p < 0.001$ ), 意味着神经质人格对消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 $\beta = 0.55, p < 0.001$ )强于该人格特质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 $\beta = -0.25, p < 0.001$ )。

## 4. 讨论

### 4.1. 神经质人格与高职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研究探讨了神经质人格特质与高职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神经质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负相

关,说明神经质对心理健康水平有直接的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Marshall et al., 1994)。在神经质维度得分越高的个体,往往存在情绪波动大,更容易体验到消极情绪的特点(Gunthert et al., 1999),如抑郁、焦虑和愤怒等。当遇到生活事件和学业压力时会更容易感到焦虑和心烦意乱。并且他们习惯于将这种情绪迁移至另一种负性情绪中,例如愤怒、悲伤(McCrae, 2010)。长时间处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都有不良的影响。

在一项横断历史的元分析中(辛自强等, 2012),虽然大学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但重点大学群体较之于非重点大学群体的提高更明显。而高职大学生作为非重点群体,他们在社会文化和就业形势中的认可度更低,有且仅有一次的升本机会和不占优势的就业趋势,使得他们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而高职生的自卑心理水平偏高(王浩, 俞国良, 2016),在面对就业、升学、同伴关系等多重压力时,易产生焦虑情绪。因此,可以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提高学生的情绪自我管理能力。另外,对一些极端情绪反应的学生,尽早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及危机干预,并加强学生坚毅、自信、勇敢和合作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

#### 4.2. 特质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特质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特质和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神经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水平,还可以通过特质应对方式间接影响高职生心理健康水平。

首先,神经质人格特质能显著负向预测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娄文婧, 李义安, 2009)。神经质特征得分具有较高的个体在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倾向于将事件视为威胁,会对困难产生强烈的情绪和生理反应,往往会采用不恰当的应对策略,如回避和逃离。因此,该人格特质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面对困难时,会更多地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忽略问题本身,而不是积极地解决问题,所以在本研究中神经质人格特质对消极应对方式的预测效应显著强于该人格特质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预测效应。

其次,特质应对方式可能会对高职生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在本研究中,积极应对方式能显著正向预测高职生心理健康,消极应对方式能显著负向预测高职生心理健康,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Andrews, 2004; Taylor & Stanton, 2007; 廖友国, 2014)。应激理论认为,个体的应对方式会对其身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Lazarus, 1993)。具体而言,当个体面临困难时,若采用积极的心态和行为来应对,努力尝试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将会有较大概率解决当前困难,从而增强其自我效能感(Andrews, 2004; Cosway et al., 2000)。即使最终未能解决问题,个体也可以从这一段努力过程中学习和成长,积累相应的解决问题的经验,增加其心理韧性,促使其心理状态能健康发展。若个体采用消极回避的方式作为面对困难的反应,其将会一直承受困难带来的压力,其情绪状态会长期低迷,这可能会导致新困难的产生,之后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将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严重阻碍。

### 5. 结论

神经质人格能通过特质应对方式影响中职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水平。

### 参考文献

- 曾伏云(2002). 学业挫折感对学生的影响及其成因.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3), 71-74.
- 陈启山, 温忠麟(2005). 高职大学毕业生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1(2), 92-97.
- 邓忠, 陈蒂丝, 陈越(2019).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分析与心理健康教育对策研究——以 H 学院为例.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32(12), 44-46.
- 黄金玲(2021). *职高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回溯性调查及个案干预*.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 姜乾金, 黄丽, 卢抗生, 姜振山, 扬爱如, 陈慧, 毛宗秀(1993). 心理应激: 应对的分类与身心健康.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4), 145-147.
- 廖友国(2014). 中国人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5), 897-900.
- 娄文婧, 李义安(2009). 人格特点影响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30(2), 137-138.
- 马焯, 陈龙, 裴华, 张凤阁, 张本, 马文有(2004). 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与应激水平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2(1), 48-49.
- 人民政协网(2022). 高职十年: 毕业生服务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比例提升明显. <http://www.rmzxb.com.cn/c/2022-08-16/3181185.shtml>
- 温忠麟, 叶宝娟(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 辛自强, 张梅, 何琳(2012). 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 *心理学报*, 44(5), 664-679.
- 徐长江, 钟晨音(2002). 浙江省大学生心理压力总体状况与来源的调查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7(6), 100-104.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 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0/quanguo/202108/t20210831\\_556364.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0/quanguo/202108/t20210831_556364.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064.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064.html)
- 周浩, 龙立荣(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 傅俏俏, 叶宝娟, 温忠麟(2012).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5), 516-523.
- 姜乾金, 刘小青, 吴根富(1987). 癌症病人发病史中心理社会因素的临床对照调查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 38-42.
- 车文博, 张林, 黄冬梅, 张旭东(2003). 大学生心理压力感基本特点的调查研究. *应用心理学*, 9(3), 3-9.
- 姜乾金, 祝一虹(1999). 特质应对问卷的进一步探讨.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8(3), 9-11.
- 王浩, 俞国良(2016).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 10-14.
- Andrews, M. J. (2004). Adolescent Engagement with Problem-Solving Tasks: The Role of Coping Strategies and Positive Emo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6, 157.
- Burger, J. M. (2014). *人格心理学*(第8版, 陈会昌,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Connor-Smith, J. K., & Flachsbart, C. (2007). Rela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Coping: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3, 1080-110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3.6.1080>
- Cosway, R., Endler, N. S., Sadler, A. J., & Deary, I. J. (2000). The Coping Inventory for Stressful Situations: Factorial Structure and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Journal of Applied Biobehavioral Research*, 5, 121-143. <https://doi.org/10.1111/j.1751-9861.2000.tb00069.x>
- David, J., & Suls, J. (1999). Coping Efforts in Daily Life: Role of Big Five Traits and Problem Apprais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7, 265-294. <https://doi.org/10.1111/1467-6494.00056>
- Fergus, S., & Zimmerman, M. A. (2005). Adolescent Resilience: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Risk.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6, 399-41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ublhealth.26.021304.144357>
- Folkman, S., & Lazarus, R. S. (1988). Coping as a Mediator of Emo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4, 466-47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4.3.466>
- Gunthert, K. C., Cohen, L. H., & Armeli, S. (1999). The Role of Neuroticism in Daily Stress and Co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1087-110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7.5.1087>
- Karasek, R. A. (1988). Job Characteristics in Relation to the Prevalence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US Health Examination Survey (HES) and the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HAN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8, 910-918. <https://doi.org/10.2105/AJPH.78.8.910>
- Kotov, R., Gamez, W., Schmidt, F., & Watson, D. (2010). Linking "Big" Personality Traits to Anxiety, Depressive,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 768-821. <https://doi.org/10.1037/a0020327>
- Lamers, S. M., Westerhof, G. J., Kovács, V., & Bohlmeijer, E. T. (2012). 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with Positiv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6, 517-524. <https://doi.org/10.1016/j.jrp.2012.05.012>
- Lazarus, R. (1993). Coping Theory and Researc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5, 234-247. <https://doi.org/10.1097/00006842-199305000-00002>

- Malouff, J. M., Thorsteinsson, E. B., & Schutte, N. S. (20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Symptoms of Clinical Disorder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7, 101-114. <https://doi.org/10.1007/s10862-005-5384-y>
- Marshall, G. N., Wortman, C. B., Vickers, R. R., Kusulas, J. W., & Hervig, L. K. (1994).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s a Framework for Personality-Health Resear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67, 278-28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7.2.278>
- McCrae, R. R. (2010). *NEO Inventories for the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3 (NEO-PI-3),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3 (NEO-FFI-3),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Revised (NEO PI-R): Professional Manual*. Non-ISBN Publisher.
- Mirmics, Z., Heincz, O., Bagdy, G., Surányi, Z., Gonda, X., Benko, A., Molnar, E., Jakšić, N., Lazary, J., & Juhasz, G. (20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Acute Psychopathology: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ping Strategies. *Psychiatria Danubina*, 25, 379-388.
- O'Brien, T. B., & DeLongis, A. (1996). The Interactional Context of Problem-, Emotion- and Relationship-Focused Coping: The Role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Fact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4, 775-813.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96.tb00944.x>
- Ozer, D. J., & Benet-Martinez, V. (2006). Personality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nsequential Outcom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7, 401-421.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7.102904.190127>
- Penley, J. A., & Tomaka, J. (2002). Associations among the Big Five,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Coping with Acute Str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2, 1215-1228.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1\)00087-3](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1)00087-3)
- Suls, J., & Martin, R. (2005). The Daily Life of the Garden-Variety Neurotic: Reactivity, Stressor Exposure, Mood Spillover, and Maladaptive Co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3, 1485-1510.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05.00356.x>
- Taylor, S. E., & Stanton, A. L. (2007). Coping Resources, Coping Processes, and Mental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 377-401.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3.022806.091520>
- Vaccarino, V., Sullivan, S., Hammadah, M., Wilmot, K., Mheid, I. A., Ramadan, R., Elon, L., Pimple, P. M., Garcia, E. V., Nye, J., Shah, A. J., Alkhoder, A., Levantsevych, O., Gay, H., Obideen, M., Huang, M., Lewis, T. T., Bremner, J. D., Quyyumi, A. A., & Raggi, P. (2018). Mental Stress-Induced-Myocardial Ischemia in Young Patients with Recent Myocardial Infarction. *Circulation*, 137, 794-805. <https://doi.org/10.1161/CIRCULATIONAHA.117.030849>
- Watson, D., & Hubbard, B. (1996). Adaptational Style and Dispositional Structure: Cop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4, 737-774.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96.tb00943.x>
- Zainah, M., Nur Akmal, A., Syazwani, A. et al. (2019). Adult Personal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tress Level and Coping Mechanism among Final Year Medical Students. *Medicine & Health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4, 154-167. <https://doi.org/10.17576/MH.2019.1402.14>
- Zhang, X., Wang, M., He, L., Jie, L., & Deng, J. (2019). Th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15. *PLOS ONE*, 14, e22162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1621>